

经济相互依赖：和平之路抑或冲突之源？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证研究（1981～2007）*

庞铭辉 敖杏林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入，政治互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和平的力量，而现实主义认为是增加冲突的根源。文章收集了1981～2007年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对综合实力”“制度性参与程度”等其他变量后，经济相互依赖的确显著提升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符合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期。随着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加强了经济往来，相互依赖不断深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极力避免冲突，而更倾向于合作，以谋求更多的经济福利。另外，对结果的分析 and 观察控制变量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经济相互依赖 冲突 和平 双边关系 周边国家

作者简介：庞铭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敖杏林，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本文所指的周边国家是指小周边，即与中国直接陆地相邻和海上相邻的主要国家。

一、引言

周边关系历来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邻里”众多的特点，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前提。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虽不乏摩擦、冲突，但总体关系的良好程度呈上升之势（见图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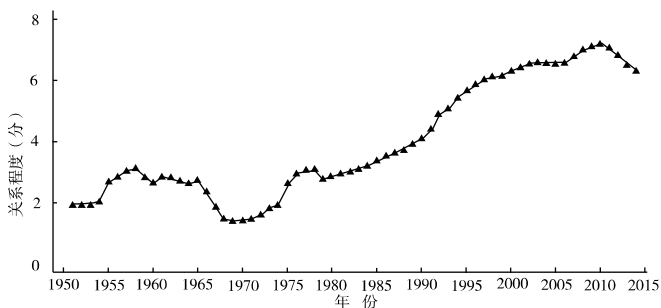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平均分走势

我们注意到，在与周边国家关系逐渐升温的同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逐年上升，这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在不断深入，由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那么，国家关系的升温与经济合作的深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深化，越能促进和平。中国周边环境改善背后的主要推手是否源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这正是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检验经济相互依赖理论的过程。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被包围于各类宗教、民族和文化之中，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无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很好样本。正如亚胡达（Yahuda）也因此曾呼吁国际理论界应考虑中国

^①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分值的测量及分值代表的含义将在下文说明。这里根据以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分值来计算周边关系的平均分：巴基斯坦、苏联/俄罗斯、菲律宾、韩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孟加拉国、缅甸、日本、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阿富汗、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经验，以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的质量。^① 本文跟踪中国与周边国家 1981~2007 年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关系变化的历程，^② 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依赖与政治关系，试图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提供一个注脚。

二、文献综述

经济相互依赖到底是促进和平还是制造冲突？当两个国家有着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时，是否会克制彼此使用武力的冲动，或者检点自己的行为以减少摩擦？数世纪以来，这个有趣的命题一直令思想家和学者着迷，但遗憾的是，该命题一直都没有定论。

对该命题的讨论和研究，大抵经历了三次高峰，即一战前、二战后的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以及 80 年代后。一战前对相互依赖的研究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代表作是安吉尔（Angell）的《大幻觉》。对经济相互依赖研究的第二次高峰，是在欧洲一体化以及 70 年代国际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发生的，代表作是基欧汉（Keohane）和奈（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前两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规范和理论分析层面。80 年代后，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开始注重实证分析，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代表人物有波洛契克（Polachek）、卢塞特（Russett）和罗斯克兰斯（Rosecrance）等。^③

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形成以下观点：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经济相互依赖增加冲突；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冲突；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关系不相关。

（一）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自由主义，其逻辑前提是经济相互依赖国家间的核心是交易纽带。因为担心这种纽带的断裂而失去贸易利益，所以不愿意发动

^① Michael Yahuda, "The Limit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3.

^② 由于笔者所能找到的文中的控制变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数据只截止到 2007 年，为了使各变量的年份一致，研究的年份只截止到 2007 年。

^③ 邝艳湘：《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相互依赖与世界和平》，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4 月，第 3 页。

战争。当两个国家的经济交往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财富增加时，一旦发生冲突，就会损失惨重，^① 由此，波洛契克在 1980 年的《冲突与贸易》一书中首次提出战争的机会成本这一概念。^② 随着经济交往的深化，国家之间形成了专业化的经济结构，冲突不但会中断经济往来，还使双方在寻找新市场或材料源的过程中，不得不重新调整原来固有的经济结构，^③ 从而增加冲突的成本。所以，基欧汉和奈指出，当两个国家处于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时，它们之间便产生了多元的利益重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很不明智。^④ 一方面，两个国家经济联系越密切，信息交流也会更频繁，这也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经济联系越密切的两个国家之间，也可以产生一种可置信的威胁信号，当经济往来发生冲突时，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来威胁对方。^⑤ 因此，可能有一方会考虑到经济成本而不敢轻举妄动。

罗斯克兰斯认为，由于各种原因，相比于战争，贸易是一条更好的获利途径。他在《贸易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科技发展和相互依赖的加深，提高了战争的经济和政治代价，降低了占领领土的相对效用，使得以战争方式获得收益的成本越来越昂贵，而相互贸易的所得，要比通过侵略领土来摄取所需更为快捷有效，所以贸易是取代战争的一种极佳手段，国家更愿意以和平、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⑥ 与 19 世纪以前的社会经济不同，如今纸币的使用使许多财富具有可移动性，被占领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通过军事征服获利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了。^⑦

① Katherine Barbieri, *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22-27.

② Solomo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4, No. 1, 1980, pp. 55-78.

③ Erik Gartzke, "The Classic Liberals were Just Lucky",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96-110.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MA: Longman, 2001.

⑤ Erik Gartzke, "The Classic Liberals were Just Lucky", pp. 96-110.

⑥ Richard N.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p. 24-25.

⑦ Solomon W. Polachek, John Robst, and Yuan-Ching Chang, "Liber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Extending the Trade-Conflict Mod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05-422.

建构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形成集体身份的必要条件，而集体身份的形成又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经济相互依赖促进了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各方原来的身份都在减弱，彼此都在学习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也在改变着自我身份的定义”，“在任何人进行任何关于行为的讨论之前，就能够创造相互依存共同再现以及相互依存所建构的‘群我’意识”，“一旦成对的‘有意义’的他者存在，在整个体系中形成集体身份的可能也就存在了”。^①因此，经济相互依赖有可能通过互构身份产生群我意识，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

（二）经济相互依赖增加冲突

与自由主义相反，现实主义声称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会增加而不是降低战争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来源于摩根索（Morgenthau）和沃尔兹（Waltz）。^②沃尔兹的观点鲜明地代表了现实主义的看法：“高度依赖意味着高度联系，这增加了偶然冲突的机会。……关系尚未规范化的相互依赖的国家必然带来冲突甚至战争。如果相互依赖的速度超过中央所能控制的速度，相互依赖就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③

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际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对国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所以相互依赖应该被理解为国家的脆弱性问题。相互依赖就是脆弱性的相互关系，处于这种关系的任何一方在打破关系状况时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的分配通常是不均等的，这就形成了依附关系。既然有了依附关系，也就产生了权力。所以赫胥曼（Hirschman）认为，在不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存在滥用力量的现象，这会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当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不对称时，特别是结构上不对称时，依附国担心对方将以这种不对称的优势影响本国的内外政策，因此，依附国为了保持自主性而不惜以军事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④奈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35页。

^②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 A. Knopf, 194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38.

^④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76-78.

也认为，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谁的依赖性小，谁就拥有权力。^①所以在巴尔比蕾（Barbieri）看来，贸易的确可以从合作中增加财富进而促进和平，但这种所谓的促进和平只能在贸易对称的条件下有效。^②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总是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会转换成军事实力，而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从而潜伏着军事冲突的根源。^③

（三）其他观点

作为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一个平衡或者衔接，科普兰（Copeland）引入一个新的自变量——未来贸易预期，认为这才是决定和平抑或战争的变量。科普兰认为，当前贸易水平低，而未来预期水平高时，经济相互依赖会促进和平，反之会增加冲突。^④其他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都附加了一些前提，如赫格雷（Hegre）以国家的发展水平为前提，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可能促进和平。^⑤有的以民主为条件，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促进和平，非民主国家之间则增加冲突。^⑥还有的将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结合起来，认为这三者既能独立地促进国际秩序又能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国际和平。^⑦

①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83页。

②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29-49.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Jack S. Levy, “The Causes of War: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Evidence”, in Philip E. Tetlock, et al.,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09-313;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56.

④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⑤ Havard Hegre, “Development and the Liberal Peace: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Trading St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7, No 1, 2000, pp 5-30.

⑥ Christopher Gelpi and Joseph M. Grieco,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Democratic State, and the Liberal Peace”,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2003, pp 44-59;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pp 267-294.

⑦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2001.

另有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与冲突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这两种关系产生于不同的原因。政治关系是政治与军事考量的结果，而经济相互依赖背后的源动力是市场和社会。国家追求安全是第一位的，当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会毫不犹豫地中断贸易。^① 巴尔比蕾和李维（Levy）的研究发现，贸易与冲突并没有显著的关系，甚至冲突两国的贸易往来还很密切，他们称之为“与敌同眠”。^② 因此，经济联系密切并不意味着能抑制冲突。

综上所述，贸易及经济的相互依赖究竟是否有利于和平或者两者无关，学者们始终观点不一。规范和理论分析无法达成共识，实证研究也得不出定论。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至今，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的大致和平，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同时，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日渐上升，发展经济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的“硬道理”。本文认为，这种空前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与长期的和平福利之间存在很强的内在联系。

本文以中国与周边国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双边关系的互动。鲁文尼（Reuveny）和康（Kang）指出，经济相互依赖领域的计量研究，在选取国家的时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标准：一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二是选择大国或者接壤的国家。^③ 中国的周边国家有大国、小国；有陆地邻国、海上邻国；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多样性应该是研究相互依赖理论一个很好的样本。但除了马斯特森（Masterson）在该领域有所研究外，^④ 目前尚无人问津。马斯特森的研究包括冷战后的观察时间段（1987~2001年），由于其参照戈德斯坦（Goldstein）

^① Barry Buz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4, 1984, pp 597-624.

^② Katherine Barbieri and Jack S. Levy,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p 463-479.

^③ Rafael Reuveny and Heejoon Kang,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tical Conflict/Coope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3, 1996, pp 943-970.

^④ James R. Masterso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Case of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009; James R. Masterson, "Analysing China'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 *China Information*, Vol 26, No 1, 2012, pp 3-33.

的方法来测量，^①然而戈德斯坦的方法并不能很好表现双边关系友好或敌对的程度，因此，马斯特森测量国家关系的方法有失偏颇。例如，在某些时点上两个国家既没有冲突也没有合作时，戈德斯坦的方法赋值为0，表明此时两国的关系既不敌对也不友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状态还处在以往“事件流”的影响之下。马斯特森选取的1987~2001年的面板数据也很不平行，而且选取的10个截面国家中，考察年限不等，这就难以捕捉事物变化的规律。其回归估计方法使用的是混合模型，也存在使估计结果发生偏误的可能。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描述

本文以政治关系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是否符合自由主义的假说。在控制变量选取上，根据前人经验以及相关理论，^②本文选取了周边国家民主指数、相对综合国力、军事支出、制度性参与程度等变量。

（一）变量的描述和操作

1. 双边政治关系

研究经济相互依赖理论，测量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多数学者从“冲突”这个变量入手，观察其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冲突本身有强弱之分，在冲突最小和冲突最大之间是一个连续谱。就双边关系而言，从发表一些不利于双边关系的讲话到爆发大规模战争都可视为冲突。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在测量时没有统一的做法，国际冲突事件数据库对冲突的选定也有不同的标准，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也通常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利用不同的数据库。

波洛契克利用冲突与和平数据库（Conflict and Peace Data Bank, COPDAB）中的数据，把冲突处理成一个连续型变量。他假设如果双边贸易

^① Joshua S. Goldstein, "A Conflict-Cooperation Scale for WEIS Events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6, No 2, 1992, pp 369-385.

^② 实际上，由于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目前这方面尚没有一个稳定的经验分析框架，在主要变量的选择上存在不小的差异，帕洛（Parlow）对这种差异有简单的总结，参见 Anton Parlow,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 New Window in Economics", 2009, https://pantherfile.uwm.edu/aparlow/www/papers/conflict_2.pdf 2015-5-10。

往来越多，双边关系越好，也即意味着冲突事件就越少。基于此假设，他定义了一个“净冲突”的变量，即两国之间的冲突分值减去合作的分值。净冲突越少表示关系越友好，反之则越有敌意。^① 巴尔比蕾把冲突界定为“两国或多国之间发生的军事警告、军事部署或真实战争的行为”。她的界定对应于她所使用的国际军事冲突数据库（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在特定的年份里，两国之间发生冲突记为 1，否则记为 0。^② 奥尼尔（Oneal）和卢塞特则利用相关战争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COW）做研究，对冲突的界定也与巴尔比蕾相似。^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测量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上述这些测量的方法都相对比较粗糙，以冲突次数的增加或降低分别反映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有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其结果可信度过低。以常用的 logit 模型为例，在测量“冲突”时，以军事冲突发生或不发生为判断标准，如果发生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按照这种取值方法，当某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在某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冲突时，被解释变量都取值为 1，这就不能把冲突的次数和级别体现出来。而在现实中，冲突次数降低或者为零并不意味着政治关系的提升。只分有无，不分程度，这样衡量政治关系是不客观的。

相比于以往的测量方法，笔者认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等人对双边关系的测量方法更为科学、准确。本文即按照该方法的程序、事件赋值标准和计算方法来测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双边关系的好坏由众多事件交织体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累积起来形成了一个“事件流”，它与新的事件共同决定着双边的关系，也即双边关系的衡量需要在事件累积和流动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该方法设定双边关系变化的分值范围为-9 到 9，其中，-9 代表两国关系最恶劣的情形，9 代表两国关系最友好的情形，这是两种极限之两端。居中为 0，表示两国非敌非友。大于 0 的属于正面关系，小于 0 的属于负面关系。在-9 到 9 之间，分为 6

① Solomo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p. 62.

②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p. 35.

③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 428.

个关系等级，由好到坏分别为友好、良好、普通、不和、紧张、对抗，每个等级里又分别有高、中、低程度之分。^①

该方法的基本流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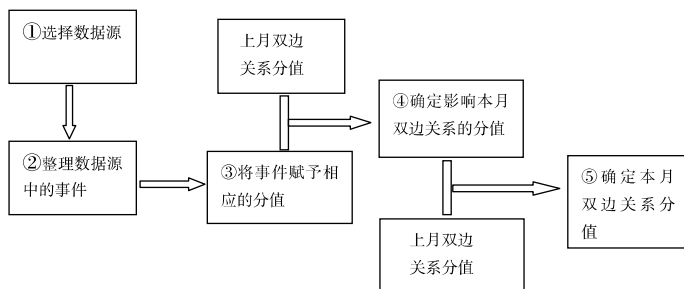


图 2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流程

在上图中，环节①是对数据源进行选择。

环节②是在数据源中对研究范围的事件进行提取和归类。

环节③是对每个事件赋相应的值。赋值有相应的分值标准。在时间序列的两国关系走向中，以月为单位，作为时间序列连接点。每个月的原始分值由当月的单个事件值相加。

环节④是把事件分值进一步转换成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值。环节④与环节③的区别在于，环节④的赋值需要考虑双边关系所处位置的影响。这是因为，当双边关系的好坏程度处于不同水平时，同一事件对该双边关系的影响力不同。

环节⑤是把由事件导致的双边关系的变化值叠加在上个月双边关系的分值上，得到当月的双边关系分值。

对于图 2 流程的环节③、④、⑤，具体由以下公式操作：

$$I = \begin{cases} \frac{N - P_0}{N} I_0 & \text{当 } I_0 \geq 0 \\ \frac{N + P_0}{N} I_0 & \text{当 } I_0 < 0 \end{cases}$$

I 表示事件在两国关系位于 P_0 时的影响力分值；N 表示两国关系变化范

^① 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0~103页。

围的绝对值； P_0 表示事件发生时两国关系的初始值； I_0 表示事件在事件分值表中的分值。

由于两国关系的变化范围是 $[-N, N]$ ，因此 P_0 的取值范围为 $[-N, N]$ 。这里 N 的取值设为 9。算出影响力分值的变化后再折算成双边关系分值的变化。^①

选择事件数据源时，要求数据源能够为研究的问题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在一定的时间跨度里，充分包含双方互动的行为事件。过去通常以国际新闻或者其他报刊作为数据源。^②“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说，无须穷尽所有的公开数据来源，只要数据来源可靠就行。例如，衡量中国与大国的双边关系，选择《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事件数据就可基本满足需要。”^③因此，从可靠性和便于操作性的角度，本文事件数据分析的数据源主要选取历年的《人民日报》（光盘版）。

该方法从合作与冲突两个维度考虑，折算出来的是一个连续型变量。由于求出的结果是以月份为单位的双边关系分值，为了对应本文研究的其他数据，需要把它转化为以年为单位。这里取当年十二个月的平均值为当年的分值。

2. 经济相互依赖

基欧汉和奈认为，相互联系并不等同于相互依赖，联系密切也不意味着相互依赖水平高，最重要的区别是，相互联系没有明显的退出成本，而相互依赖意味着断开这种联系后有明显的影响。^④为了描述这种后果，基欧汉和奈使用了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两个个性鲜明的词。敏感性是指在另一国家改变双边关系的情况下，对本国造成的直接和初始的影响。脆弱性是指一个国家在对方国家改变政策所导致的损失的情况下，本国相应的修复和反弹的能力。^⑤

① 上述具体的操作流程参见阎学通：《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22~723 页。

② Philip A. Schrodt, “Event Data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994, <http://eventdata.parusanalytics.com/papers/dir/Haney.pdf/2015-5-6>.

③ 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第 93 页。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 9.

⑤ Ibid., pp. 12-16.

巴尔比蕾把相互依赖分成两个维度考察，把基欧汉和奈描述经济相互依赖的两个指标“敏感性”和“脆弱性”合为第一个维度——显著性（salient）。显著性是指某种贸易关系相对于其他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第二个维度是对称性（symmetry），即经济相互依赖的相对平衡度。

以显著性和对称性为基础，巴尔比蕾分如下步骤计算双边相互依赖度。首先算出相对贸易的比重，即各自的依赖程度，由双边贸易额除以各自对外贸易总额所得： $TradeShare_{ij} = \frac{DyadicTrade_{ij}}{TotalTrade_i}$ 。式中 $DyadicTrade_{ij}$ 是指国家 i 和国家 j 的双边进出口贸易额， $TotalTrade_i$ 是指国家 i 对外（包括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在此基础上算出双边相互依赖的显著性程度： $Salience_{ij} = \sqrt{TradeShare_{ij} * TradeShare_{ji}}$ 。对称性程度也由此算出： $Symmetry_{ij} = 1 - |TradeShare_{ij} - TradeShare_{ji}|$ 。最后整合显著性和对称性，把两者相乘，这样便得出了相互依赖的水平值： $Interdependence_{ij} = Salience_{ij} * Symmetry_{ij}$ 。当显著性水平和对称水平都接近 1 时，相互依赖水平达到最高。^①

奥尼尔与卢塞特对相互依赖的定义与巴尔比蕾相似。他们也是首先计算出国家 i 对于国家 j 的贸易依赖度，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并非用双边贸易额除以各自的对外贸易总额，而是除以各自当年的 GDP： $Depend_{ij,t} = \frac{X_{ij,t} + M_{ij,t}}{GDP_{i,t}}$ ， $X_{ij,t} + M_{ij,t}$ 为在 t 年时的双边贸易总额， $Depend_{ij,t}$ 测量在 t 年国家 i 对于国家 j 的依赖度，相互依赖度计算公式为： $Interdepend_{ij,t} = \frac{X_{ij,t} + M_{ij,t}}{1 + X_{ij,t} - M_{ij,t}}$ 。^② 本文参照马斯特森以及奥尼尔等人对经济相互依赖度的计算方法，^③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数的经济相互依赖度（本文称“经贸相互依赖”）的公式如下：

①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pp. 36-37.

②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pp. 267-294.

③ James R. Masterson, “Analysing China’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 p. 13.

$$\text{inteGDP}_{ij,t} = \frac{\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GDP}_{i,t}} + \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GDP}_{j,t}}}{1 + \left| \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GDP}_{i,t}} - \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GDP}_{j,t}} \right|}$$

inteGDP_{ij,t}是指国家 i 和国家 j 在 t 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ShareTrade_{ij,t}表示 t 年国家 i 和国家 j 的双边贸易额。GDP_{i,t}、GDP_{j,t}分别表示 t 年国家 i 和国家 j 的国民生产总值。

同样，参照巴尔比蕾、马斯特森以对外贸易总额为基数的经济相互依赖度（本文称“贸易相互依赖”）的计算公式为：

$$\text{inteTatTra}_{ij,t} = \frac{\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TotalTrade}_{i,t}} + \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TotalTrade}_{j,t}}}{1 + \left| \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TotalTrade}_{i,t}} - \frac{\text{ShareTrade}_{ij,t}}{\text{TotalTrade}_{j,t}} \right|}$$

与以 GDP 为基数计算唯一不同的是，第二种方法以国家 i、国家 j 的贸易总额 TotalTrade_{i,t}、TotalTrade_{j,t}代替了 GDP_{i,t}、GDP_{j,t}。

这两种计算方法虽然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侧重点不同，有时计算的结果也相差甚远。如果 A 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其本国对外贸易额很大的比例，比如说 90%，但双边贸易额又只占其本国 GDP 的一小部分，比如 10%，那么它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其 GDP 的比例就只有 9%，这时对 A 国来说与中国的贸易就没那么重要了。但由于现有的文献还不能确定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优，出于稳健的考虑，本文同时采取这两种方法测量。

贸易量一直是衡量相互依赖度的主要指标，但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不断增加，FDI 也开始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些学者研究发现，FDI 与军事冲突呈负相关。^①因此，本文也将投资作为衡量相互依赖度

① Erik Gartzke and Quan Li, “War,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4, 2003, pp. 561-586; Mark Souva and Brandon Prins, “The Liberal Peace Revisited: The Role of Democracy,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Initiation, 1950-1999”,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2, No 2, 2006, pp. 183-200; Margit Bussman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143-153; Quan L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1, 2008, pp. 53-66; Hoon Lee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6, No 4, 2012, pp. 675-703.

的一个考虑因素，参考汤普森（Thompson）对投资依赖度的计算方法，^① 本文的投资相互依赖计算公式如下：

$$inteFDI_{ij,t} = \frac{\frac{I_{ij,t}}{GDP_{i,t}} + \frac{I_{ij,t}}{GDP_{j,t}}}{1 + \left| \frac{I_{ij,t}}{GDP_{i,t}} - \frac{I_{ij,t}}{GDP_{j,t}} \right|}$$

$inteFDI_{ij,t}$ 是以对外投资为指标计算的相互依赖度， $I_{ij,t}$ 是指在 t 年 i 、 j 两国的对外投资额之和， $GDP_{i,t}$ 和 $GDP_{j,t}$ 分别是国家 i 和国家 j 在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以上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都是在 0 到 1 之间的连续型分值，分值越接近 1，表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相反，越接近 0 则说明双边相互依赖程度越低。计算所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周边国家民主程度指数

据“民主和平论”者的观察，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彼此开战。1983 年，多伊尔（Doyle）对民主和平论做了长篇的系统讨论，他观察了近 300 年来世界发生的 118 次主要战争，发现虽然自由国家卷入过无数次与非自由国家的战争，但宪制稳定的自由国家之间还没有彼此发动过战争。^②

“民主和平论”者认为，由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以及相关的规范和文化痰戒律，民主国家之间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不过“民主和平论”在国内遭到了许多批评。本文把国家的民主程度作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控制变量。

4. 中国相对于周边国家的综合实力

国家之间实力的差距是是否发动武力冲突的一个重要考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均势论认为，两国之间的实力越接近，越容易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因而能够避免冲突的发生；霸权稳定论认为，两国实力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避免冲突的发生。基于此，本文把中国相对于周边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模型的一个变量（简称“相对综合实力”）。

^① Peter G. Thomps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r: Economic Deterrence to Armed Conflict*,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p. 22.

^②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 1151-1169.

各国综合实力的评估分值，本文选取战争相关计划（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W）国家硬实力数据中的国家综合实力分值（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Score, CINC）。这里以相应年份的中国综合实力的分值除以每一个周边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分值，来反映当年中国跟周边国家的相对实力。

5. 周边国家的军事支出

军事支出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控制变量，高的军事支出，可能意味着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容易恶化。这里以周边各国每年军事支出占其 GDP 的比重来衡量这一指标。各国每年的军事支出的数据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机构（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获取。

6. 制度性参与程度

不难理解，同在一个组织或联盟内的成员国家，有更多的机会碰面沟通，给争端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平台。布雷默（Bremer）的研究也表明，同一个联盟内的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机率少于联盟之外的国家。^① 如果这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周边国家与中国加入共同的组织越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机率就越小，提高政治关系的机率越大。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组织并不是真正的联盟，无法给成员国创造出硬性的义务，它们之间产生的政策只有一个“很小的共同分母”。^② 本文以周边各国跟中国共同参与组织的程度来衡量这种关系，具体的测量方法是，在某一年与中国参与同一个组织的记 1 分，同两个组织的记 2 分，依此类推。以参加以下组织为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二）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有没有促进政治关系，本文假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促进了双边政治关系的提升。

^① Stuart A. Bremer,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6, No 2, 1992, pp. 309-341.

^② Jorn Dosch, “South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ASEAN”, in Michael K. Connors, *et al.*, eds.,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82.

结合前文所述，设定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value_{it} = inteX_{it} + dem_{it} + mili_{it} + alli_{it} + capa_{it} + \varepsilon$$

模型中 i 表示周边国家 i ， t 表示年份， $value$ 指与中国的关系分值。其中 $inteX$ 包含三个不同的测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指标：经贸相互依赖程度 $inteGDP$ 、贸易相互依赖程度 $inteTatTra$ 、投资相互依赖程度 $inteFDI$ 。上述方程包含了三个回归模型，三个指标对应的回归模型在下文分别称为模型（1）、模型（2）、模型（3）。 dem 指民主程度， $mili$ 指军事支出， $alli$ 指与中国共同参与组织的程度，即制度性参与程度， $capa$ 指中国相对综合国力，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

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或者严重缺失，在面板数据的收集过程中，周边国家中没被纳入的有阿富汗、朝鲜、缅甸、尼泊尔和不丹，本文最终收集了 1981~2007 年间由中国周边 17 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为了使数据变得平稳，一些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本身为百分比、含有负数或零的变量保持原始数据。对数是严格单调增函数，不会改变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alue	双边政治关系分值	5.26	3.39	-7.42	8.30
inteGDP	经贸相互依赖度（对数形式）	-3.882557	1.893711	-11.51293	-0.6945994
inteTatTra	贸易相互依赖度（对数形式）	-3.229195	1.749534	-11.51293	-0.8067139
inteFDI	投资相互依赖度	0.000878	0.0040751	0	0.0293
dem	民主指数	1.346988	6.501585	-8	10
mili	军事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3.029033	2.887069	0.3	18
alli	制度性参与程度	1.933735	2.117735	0	7
capa	相对综合实力（对数形式）	3.147533	1.693059	-0.4543343	6.680681

资料来源：value 根据历年《人民日报》（光盘版）的事件数据计算整理；inteGDP、inteTatTra、inteFDI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dem 选取于 Polity IV；mili 根据 SIPRI 和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整理；alli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整理；capa 根据 COW 中的 CINC 数据计算整理。

四、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下文利用上述数据来实证检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的影响。我们首先对回归方程做简单的模型筛选。处理面板数据通常考虑的有三种模型：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混合效应模型是把面板数据看成一个截面数据，直接用 OLS 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差别在于，随机效应模型假设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把它当作是误差项的一部分，将模型看成随机截距项的回归方程。而固定效应模型假设个体效应和解释变量相关，把它当成解释变量来处理。在三种模型的取舍中，我们先两两对比，用 wald 检验，排除了混合效应模型。剩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甄选，通常用 Hausman 检验判断。当 Hausman 检验在 10% 水平上显著时，我们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 (1)、(2)、(3) 的 Hausman 检验都在 5% 水平上显著，所以这里只汇报固定效应的结果（见表 2）。^①

从表 2 汇报结果来看，模型 (1)、(2) 中的核心解释变量 *inteGDP* 和 *inteTatTra* 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模型 (3) 的核心解释变量 *inteFDI* 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1)、(2) 似乎给我们一个信号，即经济相互依赖能促进双边关系的提升。不过，在没考虑内生性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个结论。理论上而言，经济相互依赖在双边政治关系的方程中是具有非常高的内生性预期的，^② 因为双边关系的好坏与经济相互依赖极有可能互相作用、互为因果。例如，当双边关系趋于上升时，极有可能促进双边贸易，进而影响双边相互依赖程度。反之，当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时，也有可能迫使双方避免关系恶化。在研究经济相互依赖与冲突时，有的学者以经济相互依赖为自变量，有的则以冲突为自变量，所以这里有理由怀疑 *inteGDP*、*inteTatTra* 和 *inteFDI* 是内生变量。

① 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是 stata11。

② Arthur A. Stein, "Trade and Conflict: Uncertainty Strategic Signaling and Interstate Disputes", 2003, <http://politicalscience.osu.edu/faculty/bpollins/book/stein.pdf>

表 2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经贸相互依赖度	0.575*** (8.41)		
贸易相互依赖度		0.582*** (8.77)	
投资相互依赖度			-31.51 (-0.83)
民主指数	0.0412* (0.08)	0.0393 (1.93)	-0.00739 (-0.27)
相对综合实力	2.624*** (6.14)	2.250*** (5.29)	1.996*** (4.79)
军事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0.428*** (-7.87)	-0.414*** (-7.63)	-0.0439 (-0.49)
制度性参与程度	0.251** (4.11)	0.324*** (5.57)	0.513*** (6.55)
CONS	4.311** (3.09)	4.240** (3.07)	1.385 (0.21)
N	411	411	411
Adj-R ²	0.8541	0.8561	0.7861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中为t值。

资料来源：使用计量软件根据表1变量的估计结果。

判断是否存在内生性可采用 Davidson-MacKinnon 方法检验。Davidson-MacKinnon 检验方法的原假设是，如果不存在内生性，则无论是采用 OLS 估计还是工具变量法估计，两个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本文用该方法检验时，三个模型都在 5% 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消除内生性的办法是找到一个跟内生变量高度相关却和干扰项不相关的工具变量。由于在模型之外很难找到符合这样条件的工具变量，计量中的一个办法是以内生变量的滞后一期或者几期作为其工具变量。本文以 *inteGDP*、*inteTatTra* 和 *inteFDI* 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作为它们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表 3 是估计结果。

表 3 IV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经贸相互依赖度	0.745*** (9.48)		
贸易相互依赖度		0.798*** (9.94)	
投资相互依赖度			-43.09 (-1.01)
民主指数	0.0486* (2.37)	0.0500* (2.43)	-0.00778 (-0.29)
相对综合实力	2.479*** (5.31)	1.998*** (4.25)	1.682** (2.70)
军事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0.435*** (-7.39)	-0.421*** (-7.11)	-0.0683 (-0.71)
制度性参与程度	0.164* (2.55)	0.242*** (4.09)	0.546*** (5.54)
CONS	6.469*** (4.26)	6.641*** (4.35)	3.161 (1.70)
N	377	377	377
Anderson LR-p 值	0.0000	0.0000	0.0001
Sargan test-p 值	0.2242	0.1663	0.1127

注：①***、**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中为 t 值。

资料来源：使用计量软件根据表 1 的变量的估计结果。

为了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合理，这里做了过度识别和识别不足检验。从 Anderson LR 和 Sargan 检验来看，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不存在识别不足 (under identification) 和过度识别 (over identification) 问题。^①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内生性得到缓解后，模型 (1)、(2) inteGDP、inteTatTra 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系数都为正。模型 (3) 的 inteFDI 仍然没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相比经贸相互依赖水平和贸易相互依赖水平，投资相互依赖水平显得微乎其微，所以这里主要观察 inteGDP 和 inteTatTra 对政治关

^① 需要说明的是，Anderson LR 检验的原假设是存在识别不足问题，而 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则是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系的影响。经过控制内生性后的修正模型检验，我们认为，其他条件不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的确对政治关系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inteGDP 每提高 1%，则双边政治关系的分值相应提高 0.745 分，或者 inteTatTra 每提高 1%，双边政治关系的分值相应提高 0.798 分。

这个结果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也验证了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认为，战后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为了发展经济，中国与周边国家都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密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而这种深化使得断开这种经济联系的成本增加，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战争。当致力于发展经济时，有经济往来的国家都主动努力提升双边关系，为经济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政经互促，获得双赢。

上述逻辑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具体经验中如何演绎？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政策取向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温和反应中寻找答案。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关系的互动开辟了道路。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认识到经济是兴国之要，经济利益成为了全民族最关心的根本利益，^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心。中国认识到，经济建设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因此积极展开对外关系，1989 年跟老挝和蒙古、1991 年跟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0 与印度尼西亚复交，1992 年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地理上的临近以及经济上的互补，中国与周边国家彼此成为对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国家。

发展经济必然离不开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中国在周边外交上秉持睦邻政策，这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随后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对其进一步完善，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正在把自己的利益同周边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共同发展”。^②在这种政策取向下，经济成为提高和改善双边政治关系的一种途径，以期通过“富邻”带来“睦邻”。如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信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使得邻国和地区免于经济崩溃。中国还对受创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泰国和东盟等国给予了

^①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4 页。

^② 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载《外交评论》2007 年第 3 期，第 38～43 页。

实质性的经济援助，其行为得到周边国家的好评，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大国。^①危机之后，同样是在中国经济成长的带动下，受灾邻国才得以迅速摆脱危机阴影，并重新腾飞起来，这为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拓宽了道路。为了更好地实现合作双赢，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例如，2000年中国提出了与东盟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和2007年分别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签署了《投资协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在南亚地区，2005年中国与四国共签署53份双边文件，其中2/3涉及经贸合作。^②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同样建立了不少组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如环日本海地方政府首脑会议、东北亚经济论坛、东北亚经济会议、中俄韩朝蒙《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关于东北亚和图们江开发区环境标准谅解备忘录》等。其他类似的一系列的互利合作措施，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如滚雪球般增长，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深入，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见图3）。^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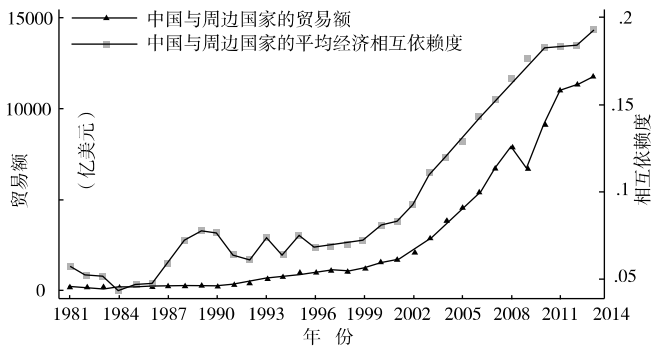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和经济相互依赖度

① Joseph Y. S. Cheng,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5, No 46, 2006, pp. 91-95.

② 刘卿：《加强睦邻外交，推动区域合作——2005年中国周边外交新发展》，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期，第58~62页。

③ 为了便于画图和观察，这里把周边国家当成一个整体。这里的经济相互依赖度是指贸易相互依赖度。

由于周边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实惠，对中国经济依赖度加深，中国也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施行“睦邻”“富邻”政策，淡化了“中国威胁”的忧虑，赢得了好感，所以周边大多数国家把中国看成一个好邻居、有益的合作伙伴和一个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①即使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周边国家并没有产生“中国威胁”的对抗反应，而是更愿意与中国合作。

从表4可以看到，在1981年，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达到友好等级^②的只有巴基斯坦和柬埔寨两个国家，约占13%；良好关系约占27%；普通关系约占40%；紧张关系约占20%。计算下来，关系良好以上的才占40%，普通关系和紧张关系占了60%，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妙。随后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友好国家的比例大大提高，到2007年，友好关系约占61%，占据绝对数量，良好关系占33%，剩下的只有日本处在不和关系边缘（0.51分）的普通关系，约占6%，所以整体的周边环境比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好。由于一些控制变量的数据的不可获得，本文前面回归分析的数据的截止年份是2007年，为了更好地探讨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这里也列出了2014年的关系分值和等级。2014年友好关系约占72%，良好关系约占17%，不和关系约占11%。对比发现，2014年的情况又比2007年复杂了一些，友好关系提高了11个百分点，同时出现了2007年并不存在的和不关系的情况，可谓喜忧并存。这说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经济实力提升到了某个关键点，周边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少数国家出现悲观预期和焦虑心态，这点在日本和菲律宾上比较突出。在中菲、中日关系中，经济的相互依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和谐。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形成了东亚特殊的二元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周边国家采取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红利中两面

^① David Shambaug,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5, p 64.

^② 这里的双边关系分值对应的等级划分如下：友好：6.9~9分；良好：3.9~6.9分；普通：0~3.9分；不和：-3.9~0；紧张：-6.9~3.9；对抗：-9~6.9。参见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第94页。

渔利的“对冲”策略，从而削弱了“以经促政”的效应，^① 甚至我们看到“与敌同眠”的现象。^② 但即使这样，我们发现周边国家与中国的主流还是倾向于合作，经济相互依赖这条纽带无疑拉近了这种关系，双赢互利的经济合作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表 4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

国 家	1981 年与中国的 关系		2007 与中国的 关系		2014 与中国的 关系	
	分值	等级	分值	等级	分值	等级
巴基斯坦	7.62	友好	7.62	友好	7.64	友好
苏联/俄罗斯	-6.58	紧张	7.93	友好	7.77	友好
菲律宾	6.62	良好	7.04	友好	-2.67	不和
柬埔寨	7.65	友好	7.68	友好	7.68	友好
老 挝	5.27	良好	7.26	友好	7.41	友好
马来西亚	2.15	普通	6.64	良好	7.25	友好
蒙 古	6.18	良好	7.17	友好	7.25	友好
孟加拉国	5.92	良好	7.40	友好	7.44	友好
緬 甸	2.00	普通	5.91	良好	6.73	良好
日 本	2.96	普通	0.51	普通	-3.32	不和
泰 国	3.90	普通	7.80	友好	7.90	友好
印 度	-3.96	紧张	5.33	良好	7.31	友好
印度尼西亚	0.90	普通	5.72	良好	6.87	良好

①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33~45页。

② 巴尔比蕾和李维的研究发现，贸易与冲突并没有显著的关系，甚至冲突的两国贸易往来还很密切，他们称之为“与敌同眠”。参见 Katherine Barbieri and Jack S. Levy,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pp. 463-479. 当然，本文指的冲突不止于军事冲突。另外，中日间的冲突有其特殊性。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日强中弱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实力显著上升，开始逼近甚至超越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陷入一种受挫的心理纠葛中，进而对中国进行挑衅、攻击，中日差距缩小的速度越快，日本挑衅行为的强度就越高。参见谢超：《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景程——基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第62~88页。

越南	-5.93	紧张	6.39	良好	6.20	良好
韩国	0	普通	7.63	友好	7.74	友好
哈萨克斯坦	——	——	7.90	友好	8.00	友好
吉尔吉斯斯坦	——	——	6.81	良好	7.62	友好
塔吉克斯坦	——	——	7.10	友好	7.80	友好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人民日报》（光盘版）事件数据计算整理。

因此，从上述过程中我们看到，出于对经济的理性需求，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了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中国通过“富邻”政策推动周边经济共同发展，而周边国家积极配合，形成命运共同体。把周边国家绑在命运共同体上的便是经济相互依赖这根绳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各国都极力避免军事冲突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冲突，而更倾向于合作，这是经济相互依赖促进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因果路径。

从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简单地观察控制变量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民主程度（dem）在模型（1）、（2）中与双边关系值呈正相关，但是在10%水平上才具有显著性，而且在模型（3）中不具显著性，为保守起见，本文对“民主和平论”这种观点持谨慎态度。军事支出（mili）在模型（1）、（2）中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负，说明周边国家军事支出越多，越有敌意，与中国的关系越不好。制度性参与程度（alli）在模型（1）中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在模型（2）、（3）中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三个模型的系数都为正，可以认为周边国家与中国共同参与的组织越多，就越有机会与中国及时沟通、对话，越能提高双边政治关系，避免冲突，这一回归结果支持了布雷默等人的观点。^①三个模型中，相对实力在1%或者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这表明，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越大，双方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是地区性大国，周边多数是小国。大国与周边小国相处是很微妙的事，由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平等，大国会影响到周边小国的政策。均势论认为，小国会联合起来对抗大国以达均势。与此相反，附势论认

^① Stuart A. Bremer,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pp. 309-341.

为小国在不同的程度上会屈服大国的意志。^①前面的实证分析结果，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附势论。

五、总 结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经济上的互利已取代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国际竞争。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都产生了加强彼此经济联系的需求，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效。当各国都致力于经济建设时，经济相互依赖便产生了和平效应。从消极角度来讲，由于害怕战争会导致既得的和未来预期的经济成果的丧失，因而极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为了扩大经济成果，增进合作，则需要友好的双边关系以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验遵从了上述逻辑，回归分析做出了验证，同时也验证了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核心命题，即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和平的力量。

在验证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衡量“双边关系”，本文采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测量双边关系的方法，来测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值，得到了更全面的双边关系分值，提高了问题的解释力。已有文献多数是从“冲突”一面考虑，认为冲突越少，则意味着关系越好，反之则越坏。但实际上，冲突减少不一定意味着合作增多，双边关系由冲突事件和合作事件构成，是两者的“化学产物”，单从“冲突”一面看不到全貌，难免遗漏许多信息。

文中分别使用三个指标（inteGDP、inteTatTra 和 inteFDI）来测量经济相互依赖度，认为以双边贸易额计算相互依赖度的两个测量指标（inteGDP 和 inteTatTra）都对双边关系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在回归结果中有着非常相似的结论，这印证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能促进双边关系的结论，也提高了经济相互依赖带来周边和平的预期。因为这两个指标分别以 GDP 和对外贸易额为基数，两个指标都对双边关系起着提升作用，当周边邻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其本国 GDP 较小比例时，有可能占其对外贸易总

^① 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 1996, pp 1-33; 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G.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3-190.

额比例较大，或者反过来，占其本国对外贸易额比例较小时，有可能占其国内 GDP 比例较大。但只要这两者的其中一个指标提高，都对双边政治关系有促进作用。相比于贸易的相互依赖，投资相互依赖度（inteFDI）显得较为微弱，其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也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是否意味着投资相互依赖不重要？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投资相互依赖非常重要。从 1979 年开始，中国与世界的投资额增长迅速。1979 年至 1984 年，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41.01 亿美元，1985 年为 19.56 亿美元，1991 年为 43.66 亿美元，此后高速增长，到 2013 年已达 1175.86 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也在不断增长，2000 年以前是以鼓励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要特征，^① 所以之前的对外投资额比较少，2000 年的对外投资额只有 10 亿美元，但此后进入快车道，尤其自 2003 年以后增长更为明显，2003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28.5 亿美元，到 2013 年已达 1078.4 亿美元。^② 这些不断增长的直接投资额，构成了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部分。因此，投资相互依赖也是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回归与结果分析，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在加深经济合作已成为促进双边关系的有效手段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继续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进一步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展开各层次、各领域以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合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打造周边外交新局面。如相继推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一系列开放新思维。其次，随着合作的深入，需要推进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加强与近邻双边、多边的合作，促使形成稳定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旦机制形成，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和冲击的能力，^③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为和平解决矛盾提供一个平台。最后，中国有必要同时采取安抚与进取相间的组合政策，一方面在经济上帮扶、带动周边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继续提高中国的相对综合国力，提高自

① 姚枝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 年第 2 期，第 131 页。

②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9 页；中国商务部等：《201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 页。

③ 高程：《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载《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第 45 页。

身在冲突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并不必然能避免摩擦甚至军事冲突，因为两个国家的互动是由多个变量综合决定的，当两国所争夺的政治目标的价值大于经济退出的代价时，经济纽带就不起作用，冲突就会发生。^① 本文得出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和平的促进效应，是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得出的净效应。从回归结果我们也看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行为更符合“附势论”，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综合国力，提高谈判筹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弱化周边国家的对抗性，使周边国家与中国更多地朝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方向发展。

当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所使用的模型无法纳入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的国际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如美国因素，它使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离心力。其次，由于数据缺失的限制，本文无法从研究的时间段上扩大样本量，如果能扩展时间段而得到相似的结果，则会更有说服力。最后，由于面板数据包含了时间序列，本文的数据可能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检验和提高。不过，在理解经济相互依赖与政治关系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提供了一个便于观察、可以讨论的局部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问题本身和研究方法而言，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① Mark J. C. Crescenz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on Peace: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Lang Ping

Abstract: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brought new vitality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volv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inue to face pressure from conflicts at the regional level, with 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yielding peace dividends onl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selects 19 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mpares thei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emerging conflicts from 1982-1997. It finds that when the risk of conflict is medium or high,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the lower the frequency of military conflict;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risk is either extremely low or extremely high, this pattern ceases to be evident. On the basis of seven case studies, it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on peace is conditioned on expected objectives, high level summits and other factors, but ultimately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specific conflict and the role of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Effect on Peac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EAN;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bout the Author: Lang P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Road to Peace or the Root of Conflict ?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 and Its Neighbor Countries, 1981-2007

Pang Minghui and Ao Xinglin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has brought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dynamics between these states. Liberalism argues tha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represents a force for peace, while realism sees it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nducted on a panel data set constructed herein, including China and the 17 of its neighbor countri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when the variables such as “relative comprehensive power” and “level of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are under contro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fact does clearly improv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which therefore meets th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of liberalism. As economic factors ar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have all worked to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ties; and as interdependence increases,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emerg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ll parties strive to prevent conflicts and prefer cooperation as a means of seeking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on bilateral relations can be a reference to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Key Wor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Conflict; Peace; Bilateral Relations; Neighbor Countries

About the Authors: Pang Minghui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Political Studies Department of School in Public Affairs at Xiamen University;

Ao Xinglin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Political Studies Department i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t Xiamen University